

绪 论

中国古代历史小说，源远流长、久盛不衰。对她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史进行专门描述与研究，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。

当我们称赞历史小说“久盛不衰”的时候，实指的内容是明确而具体的。首先是指作品的数量繁多：虽然由于诸家对历史小说之界定颇多歧议，故其公认的数量难以确指，但根据个人的了解所形成的“模糊”印象，其数量之多，自不待言。其次指有典范作品传世：只有数量，当然是说不上“久盛”的，因为草率之作，转瞬即逝，惟有名篇才能彪炳千古，以成“久盛”。历史小说的典范之作，当首推《三国演义》，这部伟大的历史小说，即使按今存最早版本计，也已流传了五百年之久，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与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形式，已确立了她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，标志着中国历史小说已达到了令人叹服不已的审美水平。再次指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：历史小说，是中国古代“尊史”文化的产物；同时，又为国人提供了不忘历史、以史为鉴的精神载体，发挥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的巨大作用。总之，久盛不衰的历史小说，是可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
然而，中国的历史小说，为什么久盛不衰？对历史小说应该如何“界定”？她的源与流又是怎样的呢？

一、历史小说久盛不衰的原因

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，记载历史的史籍汗牛充栋——这虽是老生常谈，却恰恰是历史小说久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之

一。历史上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，显示着真善美的无穷魅力；而佞臣权奸以及一切败类的劣迹，也形象地告诉人们，什么是假恶丑。于是，丰富的历史本身，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人生的教科书，同时也使历史小说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源泉。

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，儒家学说始终是社会的主流思想。而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，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是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……总之，要以社稷兴衰为己任。而当人们关注眼前的兴亡时，也就自然地要追思、探索昨天的盛衰，即要从那逝去的正邪荣辱中感知自己的使命。于是，尊史、重史之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。学子把研经读史，视为终身之修养；而广大平民百姓，虽无缘研读高文典册的史籍，但作为对天下兴亡责无旁贷的“匹夫”，同样关注着昨天的盛衰，于是，他们成为讲述历史故事的平话与演义的先天受体，他们在这里学得历史，知善识恶，扶正逐邪。历史小说，正是适应着这永恒的需要而久盛不衰。

人之需求，本属多元，张弛冷热，劳逸庄谐，皆不可废。因此，娱乐休闲之需，无疑是合理的需求。在过去，人们或者避而不谈，或者就统治阶级而言，则一概斥为骄奢淫逸，而对平民百姓而言，则以为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根本与娱乐无缘。这当然是片面的。娱乐，完全可以是在积极进取的。在古代，听说古话，阅读演义，就是积极的娱乐。历史故事中，金戈铁马、征战杀伐、保国安民、锄奸斥邪、忠肝义胆、神勇多智，无不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，受到陶冶，这无疑也是一种娱乐。历史小说本身，创造了历史小说的接受群体，而受众的娱乐需求，也促成了历史小说的久盛不衰。

因此，当人们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笔叙写一些逝去的人物故事的时候，当人们为了谋生、提供娱乐而讲说故事的时候，当人们撰著鸿篇巨制，以再现历史画面、寄寓理想、寓教于乐的时候，当人们利用声光与电子技术制作电影、电视

片的时候，丰富的历史故事，无论过去、现在或将来，永远都是最重要的题材。

二、历史小说的界定

在我们如此谈论历史小说的时候，也许并没有引起读者探究什么是历史小说的兴趣，因为无论是受约定俗成的影响，还是根据自己阅读的经验，实际上在每个人的心目中，对历史小说都已经有了一个或明确或模糊的认识。因此，当我们的讨论不得不有所深入的时候，也许会破坏了这可贵的直觉，反而造成了混乱。

历史小说，如果顾名思义，就是指讲述或描写历史人物与故事的小说。这种说法，看似简捷明快，但作为符合科学思辨的“界定”，显然是不够的，有些问题还应略加辨析。

（一）关于早期的文言历史小说

对于已成历史的人与事的权威记载，当然首推正史及《通鉴》。先秦之经籍，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乃至《左传》等，其实也是史书，所以清朝人有“六经皆史”的论断。这些经史，对历史的如实记录，使我们获知了大量的史实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，书是人写的，每一个个体的人，对史实的了解、掌握、判断，无疑受着数不尽的、甚至是很微妙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。因此，经史所载，一方面难免有大量的缺失；另一方面，也难免有所增饰。就增饰而论，或源于口耳相传之不确定性，或出于撰著者依情境之想象、据常理之推断。有论者曾指出，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中写陈涉为王时，有“故人”来访，“入宫，见殿屋帷帐，客曰：‘夥颐！涉之为王沈沈者！’”这“夥颐”二字，不过是一种语气，一种惊叹的口吻，大概即属增饰。钱钟书在《管锥编》中更明快地说：“史家追叙真人真事，每须遥体人情，悬想事势，设身局中，潜心腔内，忖之度之，以揣以摩，庶几入情合理。盖与

小说、院本之臆造人物、虚构境地，不尽同而可通……《左传》记言而实乃拟言、代言，谓是后世小说、院本中对话、宾白之椎轮草创，未遽过也。”（中华书局 1986 年版，第一册，第 166 页）总之，经史典籍之所谓“实录”、“信史”，也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而“小说”之因素，却是依稀可见的。因此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经史、史传视为历史小说（包括早期的历史文言小说及后世的历史演义）之源。

然而，史鉴毕竟是史学著作，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，保证了它们作为信史与实录的基本品格和主流价值，故与作为文学的历史小说有根本的不同。

中国的小说，历史悠久。至汉代，始有关于小说的议论：

小说家合丛残小语，近取譬论，以作短书，治身理家，有可观之辞。（东汉桓谭《新论》，见《文选》卷三一 江淹诗《李都尉》李善注）

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塗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。是以君子弗为也。”然亦弗灭也，闾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缀而不忘，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。（东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）

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古代关于“小说”的传统概念，即指以如实记载奇闻、轶事为主要内容，有一定教化作用，篇幅短小的笔记体作品，如汉魏六朝时期的大量的志人志怪之作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有一部分与后世理解的文体学意义上的小说有一定的关连，如叙事性，有一定的故事性等等；另外还有大量作品，则与小说无涉。在那些还可以称作小说的作品中，有的则记写了一些历史上的人物、故事，如《西京杂记》、《世说新语》等书中的某些作品。对此，则应该视为早期的文言历史小说。总之，中国古代历史小说，不应仅指明清时的“历史演义”，而应该包括上述早期的文言历史小说。

（二）关于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

小说，是一种文体概念，而小说“以下”所分列的“类型”，如历史小说、神魔小说、世情小说……等等，则是依据了小说的题材而划分的。但是，这里值得辨析的是，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，一般应指作家积累的源于生活的素材，而历史小说的题材，却是来自正史所载、杂史所记、民间传说……而非直接取自生活本身。因此，所谓“讲述历史人物故事的小说”，实际上是依据书史文传、民间传说，重新组织结构、注入主观意念创造而成的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写了历史上确有的人物、故事的小说，也并非皆属历史小说。若干年以前，包括鲁迅先生撰写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时候，人们把《水浒传》也看做是历史小说，道理很简单：正史确有于宋江、方腊的记载，史有其人。此外，如杨家将故事、岳家军故事等等，亦皆因见诸史籍而归于历史小说。因此，历史小说变得异常庞杂繁多。

历史演义源于宋人说话中的讲史，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。而宋人对讲史已经有了较明晰的界定（具体史料，见后文“宋元讲史平话”）。归纳起来，主要是：

第一，所讲说的内容，皆依据“书史文传”，故而“不敢谬言”；书史文传，即指《通鉴》及汉、唐历代史书。

第二，书史文传所载，无所不包，而讲史所言，则以“兴废战争之事”为主，即主要讲说“前代”之军国大事。

第三，把“隐奥”的书史文传通俗化，即以通俗的语言来讲说，使妇孺百姓都能听懂。

第四，讲说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，都有明确的歌颂正义、鞭挞邪恶的倾向性，并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，即所谓“说国贼怀奸从佞，遭愚妇等辈生嗔；说忠臣负屈衔冤，铁心肠也须下泪。”

在讲史基础上诞生的历史演义，也自然具有上述品格，《三国演义》即典型代表。由此观之，《水浒传》等书，则与

历史演义存在着明显的不同。因此，学界把《水浒传》等与历史演义区别开来，称之为“英雄传奇”。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的区别，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：

第一，如前文所述，历史演义，以书史文传为依据，杂取平话、传说，创作而成；作为小说自然有虚构与夸张。以《三国演义》为例，则公认是“七实三虚”，即全书主干依据书史，而虚构之情节则为枝蔓。七与三，在这里并不是严格的数量关系，而是指主干与枝蔓、主流与支流。而英雄传奇所演之人与事，在历史（实为史书）上，也有若干记载，如《水浒传》中之宋江，《杨家府演义》中之杨业、杨延昭，但书中的故事，则主要是在民间传说基础上虚构而成。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。

第二，绝大多数的历史演义，皆以某一断代史的兴亡为起讫，即敷演一朝一代之故事。虽然这些故事都是历史人物的行为，但一书之主线，多为一代军国大事的发展过程，如《三国演义》，始而群雄逐鹿，进而三国鼎立，终而归于一统。而英雄传奇，则往往以英雄人物或忠勇家族为核心，完整地写出他们的命运和际遇，突出他们个人的性格。如《水浒传》，特别是前四十回，恰如一个个英雄好汉的本传。

第三，历史演义有所谓“按鉴”之说，所写多军国大事，故其人物主要是王侯将相，作品之情趣，亦主要在于这些人物在政治军事斗争方面的胆识、谋略、才干与武艺，或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或忠肝义胆，文死谏武死战，有一定程度的正统史传的气韵。而英雄传奇，视野似更开阔，所写人物，除了一些王侯将相，还有很多是草莽英雄、绿林好汉，乃至鸡鸣狗盗之辈、三教九流之属，具有较浓郁的民俗气息，或者说，有的作品本身就是民间文学。

总之，描写历史人物故事的小说，实有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之分，而本书所要描述和研究的则是历史小说史，包括早期的文言历史小说及后世的历史演义。宋以后还有一些记述历史故事的文言笔记小说和拟话本，本书中暂不讨论。

第一章 秦汉至唐宋的文言历史小说

秦汉至唐宋的文言历史小说，主要指今存汉人之作、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中的某些作品及唐宋传奇中的少量作品。

第一节 汉魏六朝文言历史小说

一、汉代文言历史小说

晋咸宁年间出土之汲冢竹书《穆天子传》，当属秦汉以前之作，书中虽言周穆王事，但多涉神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之十五家小说，今皆不存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说：这十五家小说，“梁时已仅存《青史子》一卷，至隋亦佚；惟据班固注，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，或记古事，托人者似子而浅薄，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一篇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九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，第 7 页。后引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皆从此本）。“其中依托古人者七，曰《伊尹说》、《鬻子说》、《师旷》、《务成子》、《宋子》、《天乙》、《黄帝》。记古事者二，曰《周考》、《青史子》，皆不言何时作……”（第三篇，第 27 页）这些作品能否算是汉代的历史小说，自然难以确指。而《燕丹子》三卷，则是流传至今的一部历史小说。是书作者无考，成书时间自古以来众说纷纭。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成于东汉末年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：“《燕丹子》三卷，不著撰人名氏。所载皆燕太子丹事。《汉志》……无《燕丹子》之名，至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著录于小说家……至明遂佚，今检《永乐大典》，载有全文，盖明初尚存，然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、荆轲事杂缀而成。其可信者，已见《史记》，其他多鄙诞不可信，

殊无足采。”（卷一四三《子部·小说家类存目一》）所谓“殊无足采”，显然是以史籍的标准来衡量《燕丹子》，这当然是不妥的。但这段话中有两点很值得注意：一是说该书乃“割裂诸书燕丹、荆轲事杂缀而成”，这就是说在《燕丹子》成书前不仅其故事已广泛流传，而且已有文字记载。《燕丹子》即在“诸书”基础上创作（杂缀）而成；二是“其可信者，已见《史记》，其他多鄙诞不可信”，这就把《燕丹子》与史籍区别开来了，而所谓“鄙诞”，实指该书在民间传说、有关记载基础上近似“虚构”、“增饰”的内容，这恰恰是小说特有的品格。《燕丹子》在写法上与《史记》有明显的不同：其故事情节丰富而曲折，富有传奇色彩；十分注重细节描写，使情节与场面更富于真实感；巧妙地运用比喻与夸张手法，使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（参见侯忠义《汉魏六朝小说史》第14~17页）。当然，司马迁笔下的荆轲，作为《刺客列传》的传主之一，也写得十分精彩，那些极富感染力的文字，几乎都为《燕丹子》所用。由此可以看到，优秀的史传文学，对小说，特别是历史小说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。

托名汉人伶玄而实出南朝人手笔之《飞燕外传》，亦属历史小说。作品所写汉成帝之赵后故事，乃据《汉书·外戚传》及相关传说敷衍而成。飞燕少时历经贫寒，入宫后得成帝专宠，并引其妹合德为昭仪。姊妹二人与成帝在宫中骄奢淫乐，荒淫无度，充分表现了帝王宫中生活的糜烂。飞燕与合德作为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形象，个性特征十分突出：飞燕妖冶淫荡而多嫉，合德则阴柔善媚而忍让，使作品较充分地体现出小说的风貌。此外，还有一些托名汉人（如班固、东方朔等）实为后世文人所作的文言小说，也写历史人物故事，甚至书名即为历史人物，如托名班固的《汉武故事》、《汉武内传》，托名郭宪的《汉武洞冥记》等，但实际内容当属神仙故事而非历史小说。

二、魏晋南北朝的文言历史小说

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言小说中，亦不乏记写历史人物故事之作，最值得注意的是《西京杂记》、《语林》及《世说新语》。

《西京杂记》的作者问题，亦多歧议，或谓汉人刘歆，或谓晋人葛洪。唐人之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只著录书名而未注撰人；而唐人张柬之、刘知几、段成式、张彦远诸人皆明确认定此书著者即晋人葛洪。宋人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以及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亦均著录为葛洪撰《西京杂记》。书名中之“西京”，无疑指西汉京城长安，“杂记”则指书中所记宽泛杂驳，宫室苑囿、宫中杂闻、典章制度、舆服珍玩、民俗风情无所不及。其中对历史人物故事的记写，既补正史之阙，又反映了作者之文学追求，对后世文学、戏曲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，其中最为文学史家所关注的是卷二首则“画工弃市”。

王昭君故事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传统题材，本事见诸正史：

竟宁元年，（呼韩邪）单于复入朝，礼赐如初，加衣服锦帛絮，皆倍于黄龙时。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。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。单于驩喜，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，传之无穷，请罢边备塞吏卒，以休天子人民。天子令下有司议，议者皆以为便。郎中侯应习边事，以为不可许……王昭君号宁胡阏氏，生一男伊屠智牙师，为右日逐王。呼韩邪立二十八年，建始二年死（《汉书·匈奴传下》）

竟宁元年春正月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。诏曰：“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，既伏其辜，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，乡慕礼义，复修朝贺之礼，愿保塞传之无穷，边垂长无兵革之事。其改元为竟宁，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

氏”

应劭曰：“郡国献女未御见，须命于掖庭，故曰待诏。王嫱，王氏女，名嫱，字昭君。”文颖曰：“本南郡秭归人也。”苏林曰：“阏氏音焉支，如汉皇后也。”

（《汉书·元帝纪》补注）

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又增加了“昭君入宫数载，不得见御，积悲怨，乃请掖庭令求行”的记载。汉以后，此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文人笔记、诗赋中亦多提及。《西京杂记》则云：

元帝后宫既多，不得常见，乃使画工图形，按图召幸之。宫人皆赂画工……独王嫱不肯，遂不得见。匈奴入朝，求美人为阏氏，于是上案图，以昭君行。及去，召见，貌为后宫第一……帝悔之，而名籍已定，帝重信于外国，故不复更人。乃案穷其事，画工皆弃市，籍其家资皆巨万。画工有杜陵毛延寿……安陵陈敞，新丰刘白、龚宽……同日弃市。

显然，这里所记事件的内容及看待视角皆与正史截然不同，它更突出表现了对王昭君不幸命运的同情，对帝王的讽刺，对贪污索贿者的控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西京杂记》成书于《后汉书》之前，而《后汉书》却没有吸收采纳《西京杂记》所记。这充分说明《西京杂记》内容当源于民间传说，显示了《西京杂记》这则故事与史籍之不同，而具有历史小说的特点。而后世戏曲小说，如元马致远之杂剧《汉宫秋》等，则无疑深受《西京杂记》之影响。

《西京杂记》所写其他历史人物故事，如司马相如等，亦能以简捷笔墨写出人物的个性与事件的情趣。故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特别强调其文学价值，认为“在古小说中，固亦意绪秀异，文笔可观者也”（第四篇，第38页）。

《语林》，亦称《裴子语林》，晋人裴启撰。裴启，一名荣，字荣期，河东闻喜（今山西闻喜）人，东晋处士。其父穉，丰城令。《世说新语》注引《裴氏家传》谓“荣期少有风姿才气，好论古今人物，撰《语林》数卷，号曰裴子”。据《世说新语》注引《续晋阳秋》，知是书写于东晋哀帝隆和中（361~362），书中所记，盖“汉魏以来迄于今时，言语应对之可称者”。

《语林》问世后，“大为远近所传，时流年少，无不传写，各有一通”（《世说新语·语林》）。不久，由于书中所写权贵谢安二事，受到谢之指责，书遂废而不传，故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为“《语林》十卷，东晋处士裴启撰，亡”。但在南朝刘义庆之《世说新语》及刘孝标注中，大量采纳、征引了《语林》，唐宋某些类书中亦保存了部分文字。这样，清朝人（马国瀚、王仁俊等）遂有可能重新辑录成书。鲁迅也作了大量辑录工作，收入其《古小说钩沉》。

汉末清议之风，至两晋而衍为清谈，故记载言语应对之书始盛。而《语林》中通过记言，生动刻画出历史人物之言行神态，故可视为篇幅短小之文言历史小说。今仅列举几则如下：

郑玄在马融门下，三年不得相见，令高足弟子传授而已。融尝算浑天不合，召郑玄，令一算，便决，众咸骇服。及玄业成，辞归，融心忌焉。玄亦疑有追者，乃坐桥下，在水上据屐。融果转式，欲敕追之，告左右曰：“玄在土下水上据木，此必死矣。”遂罢追，竟以死。

魏郡太守陈异尝诣郡民尹方，方被头以水洗盘，抱小儿出，更无余言。异曰：“被头者，欲吾治民如理发；洗盘者，欲使吾清如水；抱小儿者，欲吾爱民如赤子也。”

孙策年十四，在寿阳诣袁术。始至，俄而外通：“刘豫州备来。”孙便求去。袁曰：“刘豫州何关君？”答曰：

“不尔，英雄忌人。”即出，下东阶。而刘备从西阶上。但转顾视孙之行步，殆不复前矣。

管宁与华子鱼少相亲友，共园中锄菜，见地有片金，管宁挥锄如故，与瓦石无异；华捉而掷去。

诸葛武侯与宣皇在渭滨，将战，宣皇戎服莅事，使人观武侯，乃乘素舆，著葛巾，持白羽扇，指麾三军。众军皆随其进止。宣皇闻而叹曰：“可谓名士矣！”

孙休好射雉，至其时，则晨往夜还。群臣莫不上谏曰：“此小物，何足甚耽？”答曰：“虽为小物，耿介过人，朕之所以好也。”

豫章太守顾劭，是丞相雍之子，在郡卒。时雍方盛集僚属围棋，外信至，而无儿书。虽神意不变，而心了有故。宾客既散，方叹曰：“已无延陵之遗累，宁有丧明之责邪？”于是豁情散哀，颜色自若。

魏武云：“我眠中不可妄近，近辄斫人，亦不自觉，左右宜慎之。”后乃阳冻眠，所幸小儿窃以被覆之，因便斫杀。自尔，莫敢近之。

魏武将见匈奴使，自以形陋，不足雄远国，使崔季珪代当坐，乃自捉刀立床头。坐既毕，令人问曰：“魏王何如？”使答曰：“魏王信自雅望非常，然床头捉刀人，此乃英雄也。”魏王闻之，驰遣杀此使。

杨修字德祖，魏初弘农华阴人也。为曹操主簿。曹公至江南，读《曹娥碑》文，背上别有八字，其辞云：“黄绢幼妇外孙蒜臼。”曹公见之不解，而谓德祖：“卿知之不？”德祖曰：“知之。”曹公曰：“卿且勿言，待我思之。”行三十里，曹公始得，令德祖先说。德祖曰：“黄绢，色丝，‘绝’字也。幼妇，少女，‘妙’字也。外孙，女子，‘好’字也。蒜臼，受辛，‘辞’字也。谓‘绝妙好辞’。”曹公笑曰：“实如孤意。”俗云：有智无智，校三十里。此之谓也。

董昭为魏武帝重臣，后失势。文、明世，入为卫尉。

乃厚加意于侏儒。正朝大会，侏儒作董卫尉啼面，言昔太祖时事，举坐大笑。明帝怅然不怡，月中，以为司徒。

何晏字平叔，以主婿拜驸马都尉。美姿仪，面绝白，魏明帝疑其傅粉。后正夏月，唤来，与热汤饼，既啖，大汗出，随以朱衣自拭，色转皎洁。帝始信之。

这些内容，不仅为《世说新语》直接采纳，而且千年之后的《三国志演义》亦多引为题材构成情节。其中“魏武将见匈奴使，自以形陋”一则，更引起大史学家刘知几的关注，据以论证此类事例，“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，况英略之君，岂其若是？”但同时也指出：“盖曹公多诈，好立诡谋，流俗相欺，遂为此说。”（《史通·暗惑》）

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言小说中，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者，当推《世说新语》。

该书由刘义庆及其身边文士共同编撰。义庆（403～444），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，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，长沙王刘道邻之子，出继临川王刘道规，后袭临川王。官至尚书左仆射，中书令。《南史·宋宗室及诸王传》说他“性简素，寡嗜欲，爱好文义，文辞虽不多，足为宗室之表。历任无浮淫之过，唯晚节奉沙门颇致费损。少善骑乘，及长，不复跨马。招聚才学之士，远近必至……所著《世说》十卷，撰《集林》二百卷，并行于世”。《宋书》本传所载，大同小异。鲁迅认为：“《宋书》言义庆才词不多，而招聚文学之士，远近必至，则诸书或成于众手，未可知也。”

梁人刘孝标为《世说新语》作注，引书四百余种，叶德辉说：“暇日取《世说》注中所引书，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，诸子百家四十余种，别集二十余种，诗赋、杂文七十余种，释、道三十余种。”（《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序》）而多数原书今已不存，故孝标所引，历来为学人所重。今本全书三卷，分设三十六门，共一千一百多则。记写人物故事上起秦末汉初，下迄南朝，而主要是东汉末至刘宋初这三百年间。

人物中包括了上至帝王后妃将相名臣，下至僧侣匠艺士庶儒生，粗略统计，较重要的人物亦有五六百人。其中所写重要历史人物，如帝王中之曹操、曹丕、晋武帝、晋明帝、晋简文帝，将相中之诸葛亮、王导、谢安、桓温、王敦，都表现了鲜明的个性。对他们言行的记写，主要是客观地叙述，但是，字里行间也显现了一定程度的褒贬，特别是三十六门某些标题的设置，如“德行”、“方正”、“雅量”以及“假谲”、“汰侈”、“逸险”等，则充分显示出褒贬的倾向性。《假谲》门开篇就连续写了曹操的四个故事，显然是对其诡诈的贬斥。

魏武少时，尝与袁绍好为游侠，观人新婚，因潜入主人园中，夜叫呼云：“有偷儿贼！”青庐中人皆出观，魏武乃入，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。失道，坠积棘中，绍不能得动。复大叫云：“偷儿在此！”绍遑迫自掷出，遂以俱免。（注：《曹瞒传》曰：“操小字阿瞒，少好谲诈，游放无度。”孙盛《杂语》云：“武王少好侠，放荡不修行业。尝私入常侍张让宅中，让乃手戟于庭，逾垣而出，有绝人力，故莫之能害也。”）

魏武行役，失汲道，军皆渴，乃令曰：“前有大梅林，饶子，甘酸，可以解渴。”士卒闻之，口皆出水，乘此得及前源。

魏武常言：“人欲危己，己辄心动。”因语所亲小人曰：“汝怀刃密来我侧，我必说心动，执汝使行刑，汝但勿言其使，无他，当厚相报！”执者信焉，不以为惧。遂斩之。此人至死不知也。左右以为实，谋逆者挫气矣。（注：《曹瞒传》曰：“操在军，廩谷不足，私语主者曰：‘何如？’主者云：‘可以小斛足之。’操曰：‘善。’后军中言操欺众，操题其主者背以徇曰：‘行小斛，盗军谷。’遂斩之。仍云：‘特当借汝死以厌众心。’”其变诈皆此类也。）

魏武常云：“我眠中不可妄近，近便斫人，亦不自

觉，左右宜深慎此！”后阳眠，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，因便斫杀。自尔每眠，左右莫敢近者。

《汰侈》中所写石崇事，行文虽冷漠，似不予褒贬，而归入“汰侈”篇本身，就表现了斥责的倾向。

石崇每宴客燕集，常令美人行酒，客饮酒不尽者，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，丞相素不能饮，辄自勉强，至于沈醉。每至大将军，固不饮，以观其变。已斩三人，颜色如故，尚不肯饮。丞相让之，大将军曰：“自杀伊家人，何预卿事！”

石崇厕，常有十余婢侍列，皆丽服藻饰。置甲煎粉、沈香汁之属，无不毕备。又与新衣箬令出，客多羞不能如厕。王大将军往，脱故衣，著新衣，神色傲然。群婢相谓曰：“此客必能做贼。”（注：《语林》曰：“刘寔诣石崇，如厕，见有绛纱帐大床，茵蓐甚丽，两婢持锦香囊。寔遽反走，即谓崇曰：‘向误入卿室内。’崇说：‘是厕耳。’”）

石崇与王恺争豪，并穷绮丽，以饰舆服。（注：《续文章志》曰：“崇资产累巨万金，宅室舆马，僭拟王者，庖膳必穷水陆之珍。后房百数，皆曳纨绣，珥金翠，而丝竹之艺，尽一世之选。筑榭开沼，殫极人巧。与贵戚羊琇、王恺之徒竞相高以侈靡，而崇为居最之首，琇等每愧羨，以为不及也。”）武帝，恺之甥也，每助恺。尝以一珊瑚树，高二尺许赐恺。枝柯扶疏，世罕其比。恺以示崇。崇视讫，以铁如意击之，应手而碎。恺既惋惜，又以为疾己之宝，声色甚厉。崇曰：“不足恨，今还卿。”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，有三尺四尺，条干绝世，光彩溢目者六七枚，如恺许比甚众。恺惘然自失。

鲁迅曾说：“《世说》文字，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

同，殆亦犹《幽明录》《宣验记》然，乃纂辑旧文，非由自造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七篇，第 61 页）这是说《世说新语》中的有些篇什，是直接取自裴启之《语林》与郭澄之之《郭子》的。但对《世说》全书，鲁迅给予极高的评价：“记言则玄远冷峻，记行则高简瑰奇，下至缪惑，亦资一笑。孝标作注，又征引浩博。或驳或申，映带本文，增其隽永，所用书四百余种，今又多不存，故世人尤珍重之。”（同上）

第二节 唐宋文言历史小说

一、唐代文言历史小说

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唐代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：“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，然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，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，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。”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八篇，第 70 页）这个“演进”、“有意为小说”的集中体现，即辉煌的唐人传奇。唐传奇，是唐代文学大花园里的奇葩，更是中国小说史长河中最优美的流段之一，她滋润了后世小说、戏曲等多种文学的创作。唐传奇，作为中国古代小说，有很多独特之处，其中之一，是所写内容多为当世之人与事。因此，当我们从历史小说的角度来审视唐传奇时，就会发现，其中写“历史”故事之作是很少的。仅有的几篇中，当以陈鸿之《东城老父传》、《长恨歌传》为佼佼者。

陈鸿，字大亮，生卒年不详。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进士，历任太常博士、虞部员外郎（属工部，掌管京城街巷种植、山泽苑囿等事）、主客郎中等职。从少年时代就注重研读史学，亦有建树。传世之作除《东城老父传》、《长恨歌传》两篇传奇，还有收入《全唐文》文三篇。陈鸿作为中唐贞元年间人，而写开元、天宝时事，无疑已是历史故事。

《东城老父传》通过贾昌从少年时代以斗鸡得宠至晚年落

魄、皈依佛门的经历，反映了玄宗以来的朝政得失和社会面貌，构思之巧妙、蕴涵之丰富，都是难能可贵的。文中的贾昌，作为宪宗元和年间的老人，历经玄宗、肃宗、代宗、德宗、顺宗，直至宪宗元和年间之社会沧桑，他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、见证人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安史之乱前的玄宗时代，是太平盛世，而眼下已是“今不如昔”。他列举实例，如当年是穿白布衣服的百姓多，穿黑色衣服的士兵少，而后来却正相反，说明老百姓都被迫去当兵了，这是战乱频繁造成的反常现象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他看来，那太平盛世的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尽管他本人少年得志，备受宠幸，但由于玄宗沉溺于酒色玩乐之中，已经注定必将有大难降临。仅就斗鸡而论，对社会风气的败坏，实已不可收拾。对于这些社会政治问题，贾昌的亲身感受无疑是正确的。贾昌作为一个文学形象，被刻画得惟妙惟肖，特别是在斗鸡场上的表现，写得既形象又传神，使读者有亲睹亲历之感。兹摘引片断如下：

老父，姓贾名昌，长安宣阳里人。开元元年癸丑生。元和庚寅岁，九十八年矣。视听不衰，言甚安徐，心力不耗，语太平事历历可听……

十四载，胡羯陷洛，潼关不守。大驾幸成都，奔卫乘舆。夜出便门，马踏道阱伤足，不能进，杖入南山。每进鸡之日，则向西南大哭。禄山往年朝于京师，识昌于横门外。及乱二京，以千金购昌长安、洛阳市。昌变姓名，依于佛舍，除地击钟，施力于佛。泊太上皇归兴庆宫，肃宗受命于别殿，昌还旧里。居室为兵掠，家无遗物。布衣顛顛，不复得入禁门矣。明日，复出长安南门，道见妻儿于招国里，菜色黯焉。儿荷薪，妻负故絮。昌聚哭，诀于道。遂长逝息长安佛寺，学大师佛旨。大曆元年，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，立陀罗尼石幢。书能纪姓名；读释氏经，亦能了其深义至道，以善心化市井人。建僧房佛舍，植美草甘木。昼把土拥根，